

The Red Archives Bear Witness to the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of Cadres in the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WANG Dongmei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Received: November 8, 2024

Accepted: December 2,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Dongmei. (2025). The Red Archives Bear Witness to the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of Cadres in the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219–22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24>

Abstract: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 fundamental, profound, and endur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a nation. Red culture is the most brilliant star in the historical river of cultural confidence. Red archive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d culture. Studying the red archives of the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during the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multiple months that the Soviet Area existed, the reason for its vigor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as mainly due to the earnest strengthening of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the loyalty and dedi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strict self-discipline, selflessness and self-sacrifice, and the spirit of not fearing the enemy's sacrifice. These Soviet spirit elements provided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t the new stage, in the face of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arty must consistently enforce discipline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nsure that the Party always stays ahead of the times and leads and guarantees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in a Chinese-style manner.

Keywords: red Archives;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work style construc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Dongmei, born in March 1981, holds a master's degree. She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er research focus is on red culture.

紅色檔案見證川陝蘇區幹部作風建設

王冬梅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摘要: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紅色文化則是文化自信歷史長河中最耀眼的星光。紅色檔案是重要的紅色文化來源,研究川陝蘇區紅色檔案,川陝蘇區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能如此發展壯大,重要原因就是切實加強作風建設,忠誠忠貞的理想信念、嚴於律己、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不畏敵人的犧牲精神,這些蘇區精神都為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的保障。進入新時代,邁步新階段,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我們黨要一以貫之嚴明紀律規矩,加強作風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才能確保我們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引領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不斷前行。

關鍵詞:紅色檔案;川陝蘇區;作風建設

紅色檔案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具有歷史價值、教育意義和紀念意義的檔案,它蘊藏着黨的初心使命,承載著紅色基因,飽含着集體記憶,是重要的紅色資源。研究紅色檔案為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作風紀律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支撐和良好借鑒。本文以川陝蘇區幹部作風紀律建設為例,淺談紅色檔案賦能新時代作風建設的現實意義。

一、紅色檔案中川陝蘇區幹部作風建設回顧

1932年12月,鄂豫皖蘇區紅軍轉戰四川通南巴地區,建立川陝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到1935年5月,為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川陝蘇區紅軍撤離該地區,前後共歷時兩年多。在川陝蘇區存在的這兩年多時間裡,成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川陝蘇區從建立、鞏固,到大發展,各項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並且有力牽制了敵軍,策應和支援了紅軍長征,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紅四方面軍能夠取得如此巨大成績,根本原因在於其繼承了中央蘇區與鄂豫皖蘇區嚴明的政治紀律以及良好的作風建設。

(一) 愛國愛黨、忠誠忠貞的堅定信念

從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衝破敵人多重封鎖線,最終抵達大巴山建立根據地的過程中,經受住了惡劣自然環境的無情考驗,在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搏擊中經受住了對理想信念的嚴峻考驗。在蘇區建立並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僅要面對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和一次次的戰略圍剿,更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發展壯大,對每一個蘇區官兵幹部來說都是一次堅定理想信念的嚴峻考驗。正是這種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信念,把廣大官兵幹部凝聚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之下,克服艱難險阻戰勝形形色色的敵人,把川陝蘇區發展壯大。期間很多的群眾受革命影響進而參加革命,著名烈士胥克尋就是典型代表。1929年春夏之際,胥克尋去蓬安縣買鹽巴欣聞得知曠繼勳部在蓬安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擔著貨擔,急忙趕至起義地點,得知曠部已轉移後。他又日夜兼程,輾轉追蹤途至營山、達縣、梁平。在得知曠部起義失敗的消息後,只好轉身回家。胥克尋雖然此次所願未遂,但追求革命矢志不渝。1930年夏天,胥克尋途經營山縣清水場附

近,得知此地有中共地下黨活動,他通過各種關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党的秘密交通員,活動在重慶至川東的梁平、達縣、宣漢和鄰水一帶。1932年,紅四方面軍入川,他立即參加紅軍,任江口縣紅軍獨立營營長,1934年英勇犧牲。^①

翻閱川陝蘇區紅色檔案,紅四方面軍創建川陝革命之時留下的十六字軍訓訓詞「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鬥、不勝不休」就是堅定信念的最好體現。

(二) 嚴於律己、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

川陝蘇區時期,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廖承志、許世友等在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歲月中建立了不朽的卓越的功勳,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川陝蘇區官兵幹部的優良作風是在艱苦殘酷的鬥爭環境中逐步養成的。

「縣委機關有幾百人,時大時小,也沒有固定編制」(訪傅崇碧記錄)。鄉村蘇維埃幹部每月沒有固定薪金,生活來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自帶錢糧,穿自己解決;沒收錢糧和公田提留補助一點;農民群眾籌集一點^②。

在反三路圍攻中,敵人截斷了從南部到通江的食鹽運輸線路,造成通江一帶食鹽奇缺。地下交通站繞過敵人封鎖運回一批鹽巴,擔任紅軍總經理部部長的鄭義齋立馬組織人員及時分發。分發中,鄭部長取出半斤鹽巴,並囑咐警衛員說:「你把這包鹽巴送到總部徐總指揮那裡去,他跟大夥一樣,也在唱旦(淡)腳兒呢。」

幾日前鄭義齋和徐向前總指揮一起研究工作直到很晚,就留在徐總那裡吃晚飯。炊事員端上的兩盤小菜,由於沒有鹽巴吃起淡而無味。鄭義齋想着徐總日夜操勞,肩挑重擔,如今有了這批鹽巴,送點過去也是合情合理的。

沒過多久警衛員拿着鹽巴和一張字條從徐總處回來了。字條上面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裡已經有了鹵肉水,鹽巴還是留著你自己用吧。」鄭義齋凝視著字條,眼淚潤濕了眼睛。他想了想,又讓警衛員把這包鹽巴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傷患們吃到鹽巴並聽說這鹽的來歷後深受感動,當場就要求提前返回前線,經醫生批准,有16名傷患回到前線部隊。

戰勝那個缺衣少食的困頓歲月,靠的正是嚴於律己、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

(三) 走群眾路線,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的公僕精神

隨著根據地的迅速擴大,各項事業的建設、管理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援和參與,人民政權的鞏固和保衛也需要廣泛動員人民群眾。川陝蘇區官兵幹部深知,離開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部隊和政府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川陝蘇區官兵幹部把發動組織群眾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將根據地的開闢和政權的建立與群眾工作緊密結合起來,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川陝蘇區明確指出「黨與群眾的關係,要建立的十分密切……要清楚瞭解群眾的需要,提出他們的鬥爭綱領。」^③當時川陝省委發佈的《黨員須知》中指導黨員幹部在群眾中應該怎樣去活動,例如生活絕對不能腐化等。^④據資料記載,川陝蘇區幹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川陝蘇區官兵幹部據此扎實工作,深得民心。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裡,根據地人民輸送了十餘萬優秀兒女參加紅軍。他們還節衣縮食,發展生產,為支援紅軍部隊建設和戰爭需要,提供了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物資。這些成績的取得都得益於川陝蘇區走群眾路線,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的公僕精神。

(四) 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不畏敵人的犧牲精神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⑤,川陝蘇區發展迅猛,與當時的黨員幹部勇於解剖自



己,真誠對待同志有著密切關係。在當時險惡嚴峻的鬥爭環境中,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川陝蘇區幹部糾正黨和紅軍中對革命前途悲觀動搖情緒的有力武器。川陝蘇區黨員幹部在運用批評的武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注重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解剖自己,不斷改進工作作風。

在創建川陝蘇區的過程中,面對生活的嚴峻困難、敵人圍剿的險惡環境和大量流血犧牲的社會現實,官兵幹部發揚了不怕困難,不畏敵人的犧牲精神。徐向前將軍在《憶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中說:「徐深吉同志帶著一百二十來人的教導隊守在山上,對付敵人一個團,最後只剩下幾十個人,可敵人還是攻不動。部隊真頑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糧食少,吃飯很困難,有時連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飯也喝不上,靠野菜充饑;天氣又熱,蚊蟲又多,醫藥又缺,彈藥又少。我們靠什麼和敵人熬呀,就是靠黨的領導,靠士氣,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條心,靠平素養成的過硬戰鬥作風。」

二、紅色檔案中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由來

歷史無聲,檔案有痕。翻閱紅色檔案,探究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歷史由來,感悟和汲取信仰力量,為新時代幹部作風建設提供借鑒。

(一) 振興中華的使命擔當和黨的先進理論是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思想基礎

川陝蘇區各級黨組織無論處於何種狀態下,都十分重視對黨員幹部進行嚴格的思想政治教育,當時全體黨員幹部都牢固樹立了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謀利益的思想。廣大黨員幹部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牢記勞苦大眾的疾苦和訴求,頑強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推動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展現了黨員幹部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使命和歷史責任的擔當。

同時黨的先進理論為官兵幹部提供了很好的引領。川陝蘇區曾在一份決議案中指出:「提高黨員的理論學習——一個黨員若沒有受先進革命理論的指導,就很難執行其所負重大任務,所以每個黨員必須要加強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⑥。當時就有「省委黨校」、「臨時黨校」,彭楊軍事政治學校(戰地黨校)等等培養幹部的各種學校。通過這些培養舉措,黨員幹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治覺悟和理論水準,堅定了革命信念,促進了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形成。

(二) 輿論宣傳的推動作用是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催化劑

紅軍入川以來就要求「各項工作宣傳工作要打先鋒」,川陝蘇區的黨政軍領導十分重視宣傳工作。紅軍入川前,反動軍閥極盡對紅軍的污蔑,如反動宣傳「紅軍區域的老年人要殺,小孩子要殺,不服從者要殺,不上前(線)作戰者殺,機關公務人員要殺,不服姦淫者殺……」^⑦還千方百計孤立紅軍,宣稱「紅軍是鄂豫皖來的,我們打紅軍與四川的窮人不相干。」^⑧因此消除群眾的疑慮和惶恐自然成為紅軍入川後的第一要務。

同時壯大根據地,管理幹部也離不開宣傳工作。一是先後創辦了種類繁多的報刊,主要有《幹部必讀》《川北窮人》《共產黨》《蘇維埃》《戰場日報》《紅軍》《少年先鋒》,這些報刊起到了鼓舞廣大工農兵群眾為戰勝敵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積極作用。二是高度重視利用石刻進行革命宣傳。石刻主要包括革命文獻、標語和對聯。這些數量龐大的石刻遍佈於城鄉各地,可謂是見縫插針,無處不標語,故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隨時隨地衝擊幹部群眾的視線,對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

(三) 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幹部作風監督和懲戒機制是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保障機制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紀律是行動的保證。翻閱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其中「絲毫不放鬆的反對一

切脫離支部和消極怠工的分子,甚至開除他們的黨籍」、「為了加強各級的領導作用,並瞭解下級工作情形,必須有經常巡視工作,並儘量根據黨的決議檢查工作,切實執行黨的訣議」^⑨、「經常派出黨的負責幹部到部隊和地方基層單位巡視工作,瞭解情況,解決問題」^⑩。這些良好的監督懲戒機制都對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形成起到了好的震懾作用。

三、弘揚紅色檔案中川陝蘇區幹部好作風的現實意義

「紅色文化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奮鬥進取的歷史,對外講好紅色故事有利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制度有全面、客觀的認識」^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現實、未來也是相通的,翻閱川陝蘇區紅色檔案,對我們總結過去的成績和不足,評判現實路線方針是否恰當做到能做到「心中有數」,並預判未來的道路的怎樣走能做到「心中有路」。

(一) 信念堅定是新時代幹部作風紀律建設的基本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一切向前看,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理想信念不僅是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作為新時代幹部就要傳承老一輩紅軍幹部的堅定信念,確保共產主義旗幟永不褪色。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自信,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爭做新時代的好幹部。

(二) 勇於擔當才能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的鬥爭,宏偉的事業,需要高素質幹部。」無論在革命戰爭年度,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要求黨員幹部不但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還要有勇於擔當的精神和能力素質。「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幹才能出政績,才能取信於人民。習近平總書記說,「為官避事平生恥。」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當官不想幹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對於領導幹部來說,面對區域發展和百姓幸福,就應勇於擔當敢於創新,切實改變不合時宜的觀念與做法,助推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前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

(三) 嚴明的紀律是黨的生命線

嚴明的紀律和規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生俱來的內在品質,是思想建黨、組織建黨的重要基礎。從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走出的中國共產黨能帶領人們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從苦難走向輝煌靠的正是嚴明的紀律作保障。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更加複雜,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各種因素也是明暗交雜。開展黨紀學習教育,學習貫徹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強化黨員幹部的作風紀律意識,知敬畏明底線,既是對紅色檔案中黨紀要素的繼承和發揚,也是應對當前複雜執政環境的必要手段。

(四) 強化監督是確保黨紀執行的利器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經常性和集中性相結合的紀律教育機制,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歷數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強化監督是確保政黨有序運行的有力武器。如果缺乏監督,或者監督不到位,就會出現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等問題。



由此可見,加強監督,尤其是加強黨內監督,是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在完善黨紀監督方面,應當借鑒革命時期黨的紀律監督經驗,將經過歷史檢驗、行之有效的制度元素融入現代黨紀法規之中,增強其歷史厚重感和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 ① 中共平昌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平昌縣歷史(1921—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年第一版,頁 32。
- ② 參閱中共通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通江蘇維埃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頁 90-91。
- ③ 溫賢美:《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④ 劉昌福,葉緒惠:《川陝蘇區報刊資料選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71。
- ⑤ 習近平:《堅持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提高領導班子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人民日報 2013 年 9 月 26 日。
- ⑥ 溫賢美:《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⑦ 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院、川陝革命根據地博物館(編):《川陝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集成(下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 ⑧ 四川省檔案館(編):《川陝蘇區報刊資料選編》,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7 版。
- ⑨ 溫賢美:《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⑩ 林超,溫賢美:《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8 年版,頁 181。
- ⑪ MENG Jiarong & XIN Hongjuan. (2022). Exploration of Zhejiang red culture going glob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67-074.

(Editors: LI Ruobing & Joe ZHANG)